

動足跡又是如何影響南京的城市進程？再次，本書副標題中的「都市性」一詞，似乎會給讀者帶來作者依舊在西方現代性話語體系中探討城市史的錯覺。或許，作者在使用「都市性」進行中西學術對話的同時，不妨結合中國經驗，賦予這一概念新的定義。最後，作者以行政層級高、經濟層級高的「中心地」南京為分析對象，對傳統中國的城市特徵作出深入分析，而明代南京因其特殊的城市地位，或多或少會影響作者構建一種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城市模式。若能在研究時段上加以延長，同時更多地與其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比較，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中國城市的發展模式。

以上的建議也許來自筆者的誤讀，畢竟瑕不掩瑜，它們絲毫不影響這部優秀著作對重塑讀者認知的貢獻。近年來，作者將研究下限擴展至清代，着力於在更長時段上考察南京城市史，相信作者的後續成果能再次推進我們的認識。

鮑純晨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

謝景連，《「插花地」：文化生態、地方建構與國家行政——清水江下游地湖鄉的個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40頁。

「插花地」是伴隨國家行政區域調整而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在有關插花地問題的討論中，插花地的成因與延續成為研究者聚焦的重要議題，人們習慣將存續歸咎於國家行政決策失誤和接管不力的結果。事實上，作為國家政治話語的插花地，國家行政力量確實起到一定的主導作用，但若將插花地的成因簡單歸結於國家行政，無視國家行政決策背後的深層原因以及生活於插花地之上不同人群的能動意識，自然無法釐清插花地形成以及存續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通過新的材料和方法來拓展和深化插花地及其相關研究成為學界迫切的要求，謝景連新近出版的《「插花地」：文化生態、地方建構與國家行政——清水江下游地湖鄉的個案研究》（下文簡稱《「插花地」》）一書正是這樣的努力與嘗試。

《「插花地」》一書緒論部份主要對插花地及其相關研究進行學術史梳理以及開展地湖插花地個案研究時觀照的理論維度與方法；第一章概述田野

調查點貴州省天柱縣地湖鄉在行政、自然、生態與人文等方面的「孤島」狀況；第二章從歷時向度梳理地湖從「蠻地」到「插花地」的歷史演變過程；第三章以地湖吳氏宗族為例，討論地湖插花地不同人群的自我表述與能動意識；第四章討論國家行政視域下插花地生成與延續背後的不同主體及其能動性；第五章敘述民國時期地湖插花地遭遇「清理撥正」及其存續的歷程；第六章探討地湖插花地在地方社會自我建構和發展中的內在張力；結語與討論部份重新審視插花地形成以及長期存在的深層原因，並就插花地與人類學結合研究的可能性予以探討。

從這些深度的文獻史料解讀和精細的田野調查資料分析中，謝景連立足於貴州東南部天柱縣地湖鄉的社會事實，以人的社會實踐為切入點，從文化生態、國家行政與地方建構三個維度來解釋地湖插花地得以形成和延續的原因。

其一，文化生態是插花地得以形成的基礎和潛在因素。謝景連認為，地湖鄉可視為四重意義之「孤島」。從行政歸屬來看，地湖鄉屬於貴州省天柱縣管轄，但卻「飛落」湖南省會同縣，是一塊在空間分佈上伸入甚至被包裹在其他行政轄境之內的插花地；從自然地理結構來看，地湖是壩區中的丘陵，是濕地生態系統包圍中的山地叢林生態系統，是一片山地孤島；從民族成分看，地湖的主體居民為苗族，周圍則是侗族與漢族，它是侗族文化分佈區與漢族文化分佈區包圍的苗族文化孤島。正是這種文化生態上的交錯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成為地湖得以形成插花地的潛在制約因素。

其二，行政區劃變動和調整是插花地形成的主導因素。謝景連指出，插花地是伴隨國家行政區劃調整而伴生出來的產物，若沒有統一的行政轄區和統一的行政管理，插花地就不會出現。為此，作者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漢文獻典籍出發，詳細解析地湖從「蠻地」到「插花地」身份轉換的機制與內在邏輯（見第二章）。隨着王朝變動以及行政區劃調整，插花地的存續問題又被作者巧妙地置放在民國「清理撥正」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而指明置於特定場域背後插花地問題的歷史敘事與脈絡（見第五章）。概而言之，插花地的形成與國家行政區劃調整及制度性介入有關，地湖插花地的形成是國家在「改所建縣」背景下國家立足地方事務實情而做出的選擇，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和多種力量博弈的結果。

其三，地方建構是插花地成因與存續的能動性因素。謝景連主張通過地湖社會建構過程的考察，很容易見到「人」在地湖鄉插花地形成和延續中的影響，折射地方之自主性。地湖鄉的主體人群吳姓和遠口吳姓人群基於「酸

湯苗」的文化標識形成族群認同，通過修撰族譜等具體的社會活動，兩地吳姓人群保持共祖同宗關係。此外，地湖與遠口片區的吳姓人群被明廷認定為相同的「苗」，或許是地湖與遠口同被劃屬天柱的重要情由，也是地湖鄉成為「插花地」的直接原因。不僅如此，地湖吳姓人群通過編製祖先開基傳說及墳山紛爭等故事，在申明入住地湖「合法性」的同時，也確保插花地得以延續的合理性。由此看來，地方建構成為考察插花地成因和延續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作為一項鄉村社區研究，《「插花地」》一書不僅對插花地這一概念進行深度的討論和澄清，還「走向歷史現場」，通過收集遺存在當地聚落的各類碑文、族譜、家譜、契約、告示、宗教科儀書、帳簿等文獻資料和尋訪當地村落的故事、傳說、神話、民謠、地方掌故、名人軼事等民族志資料來探究地湖插花地形成始末，並討論不同歷史時期生在地湖的人群是如何通過自己的日常生活實踐去強化「地湖人」的身份認同，致使地湖插花地身份一直保留至今的社會文化歷史過程。這樣的研究範式，無疑對插花地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有着重大的學術價值：一是明確自然與生態系統是插花地得以形成的終極制約因素；二是認為插花地是國家行政建置中的一種可行選擇；三是確認插花地是多重因果關係綜合作用和多種力量博弈的產物。毫無疑問，它將給歷史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結合研究帶來更多的期待與思考。

然而，本書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雖然作者一再強調不想將插花地問題置放到「國家—地方」式的二元對立框架去探討，而試圖採取更為立體和多元的分析框架來理解，但是在實際的論證過程中似乎未能擺脫「國家—地方」這一傳統的解釋框架。的確，「國家—地方」視角可以清晰地揭示插花地得以形成和延續的歷時性過程。但在共時向度的比較方面，比如，地湖鄉與其他插花地的比較分析卻鮮有涉及。哪怕是書中圍繞插花地形成而展開博弈的諸主體，重點還是集中在吳姓宗族及其故事敘述與展演上，而對於地湖域內其他宗族的觀照以及地湖鄉外的侗族或漢族等他者人群的審視（他者邊界視角）則無形被遮蔽。

其次，以「文化生態共同體」為認知基礎是本書開展研究的關鍵與理路。作者正是基於地湖插花地社會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最終用事實說明插花地的形成有其濃厚的文化生態成因，還有不同主體較為直接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考量，以至於國家和地方在某種程度達成協商與共識，進而不得不承認或默許插花地的長期存續。在生態環境解釋尤其強調自然地理因素時，插花地容易被簡化為地理空間分佈與生態系統差別的異類，「孤島」一詞也就

容易陷入環境決定論的嫌疑；在涉及社會文化時，作者曾用「同質」等詞語來劃分和提取不同的社會文化樣本，這多少類似類型學的表述與理解。此外，對於插花地共同體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以吳氏先祖入住地湖為討論中心，旨在探討地湖人身份建構背後的社會性與能動性。在這些饒有趣味的民族志個案中，隱藏着一條由婚姻、家庭、親屬關係而至探究社會事實的主線，那麼，關於地湖婚姻、家庭與親屬關係的締結與伸縮勢必也影響着插花地的形成、分裂與重組。因此，由婚姻家庭與親屬制度所延伸出來的人群互動及社會關係問題來探討插花地仍存在很大的學術空間。

最後，關於文獻資料和田野民族志背後不同主體及文化實踐的選擇問題。本書所關注的主體是志史文獻資料背後的國家及精英和生活於插花地的鄉民，它們實質代表中國「金字塔」式政治結構體系的兩極，作者抽取頂端和底層，遮蔽中間，並且將這兩端的主體能動性簡化為國家制度精心設計的範疇或地方社會能動意識的結果。由此，圍繞插花地的存續構成國家與地方的文本。除國家明確的律令和地方社會的能動性外，對於那些有志於經營帝國邊疆的官員以及試圖從中獲利的鄉紳等地方精英或者近現代介於國家與基層之間的地方官員而言，插花地成為他們爭取國家資源的平臺，其間的博弈與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着插花地的存續與興廢，但遺憾的是未能被置放到一個明確的層面上來討論。

王金元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凱里學院

錢晶晶，《歷史的鏡像：三門塘村落的空間、權力與記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30頁。

作為清水江研究範式的實踐成果之一，《歷史的鏡錫像：三門塘村落的空間、權力與記憶》一書是基於《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市場、權力與社會》一書所勾勒出的清初以來清水江流域區域社會綜觀式歷史過程圖像而進行的沉浸式村落田野研究。作者錢晶晶宣稱，「本書仍是立足傳統人類學視角下的整體觀的村落研究，致力於在對村落的地理概貌、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文化範疇的各方面進行結構性的總體把握的基礎上，解釋人們日常生活表象之下深層的文化象徵意涵」。（頁6）